

旧闻拾遗

1934年夏秋之际，郁达夫先后沿胶济、津浦铁路游历，后来撰写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其间诞生了散文名篇《故都的秋》。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乘火车，郁达夫一分钱没花，他持有的居然是铁路免票！《故都的秋》，也是一位铁路作家的催生之作。

郁达夫：免费坐车逍遥游

□ 于建勇

1934年8月12日，在青岛开往济南的火车上，坐着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男的文弱瘦削，女的漂亮丰腴，随行的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他们就是郁达夫、王映霞夫妇及其长子郁飞。

郁达夫(1896年-1945年)，原文名，字达夫，浙江富阳人，著名作家，新文学社团“创造社”发起人之一(另有郭沫若、成仿吾)。一生著述宏丰，自传体小说《沉沦》，震惊文坛，惊世骇俗。1923年到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东大学任教。1928年加入太阳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主编《大众文艺》。

在坊间，郁达夫与王映霞沸沸扬扬的情感纠葛，被认为是“现代文学史中最著名的情事”之一。

王映霞(1907年-2000年)，杭州人，毕业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秀外慧中，美艳照人。

1927年1月14日，寓居上海的郁达夫，在同学孙百刚家，遇见了惊为天人的王映霞(为避战乱，王映霞随父亲的莫逆之交孙百刚夫妇到沪)，顿时神魂颠倒，方寸大乱，遂展开激烈而又狂热的追求。3年后，王映霞20岁，已有婚约；郁达夫31岁，使君有妇。

但生性浪漫的郁达夫顾不上这些，用生花妙笔写就一封封火辣情书。王映霞终于被他的痴情所打动。3个月后，二人订婚。次年2月结婚，郁达夫抱得美人归。柳亚子赠诗郁达夫：“富春江上神仙侣。”

青岛：暖风熏得游人醉

踏上胶济铁路这天，是他们结婚的第六年。这年6月底、7月初，杭州酷热难耐。据郁达夫《避暑地日记》记载：“路上柏油熔化，中暑而死者，日有七八人，桌椅有如热水壶。”寓居于此的郁达夫应友人汪静之(时在青岛市立中学任教，其妻符竹与王映霞是同学)、卢叔桓之邀，偕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于7月6日离开杭州，乘船北上。7月13日，到达凉爽宜人的海滨城市青岛。

郁达夫本来在这里度过一个悠闲的暑假，“第一当收敛精神，第二当整理思想，第三才是游山玩水”，读读书，写写文章。令他没想到的是，游山玩水反倒成了首位。接待应酬，让他无暇他顾；“淫暖之风”，让他无法静心。最后竟“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

暖风熏得游人醉。在郁达夫眼中：“外国的东方舰队，来青岛避暑停泊的数目实在太多，因而白俄的娼妇，中国盐水妹(引者注：旧时称接待外国人的妓女)来赶夏场买卖的也混杂其中，热闹到了使人分不出谁是良家的女子。喜欢异国颓废情调的人，或者反而对此会感兴趣，但想去看一

点书、做点事情的人，被这些酒肉气醉人的淫暖之风一吹，总不免感到头昏脑涨，想呕吐出来。”(《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夏天。郁达夫深深感到：“我今年一个夏天就整整被这些活春宫冲坏了的；日里上海滨去看看裸体，晚上在露台听淫辞，结果我就一个字也没有写，一册书也没有读。”(同上)

这对一位作家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何况，郁达夫还指望稿费养家糊口呢。据悉他的书房内，挂着老乡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所以郁达夫下定决心：“明年我就打算不再去青岛，而上一个更清静一点的海岸或山上去过夏天。”(同上)

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到了新秋微冷的时候”，8月12日早晨7点，郁达夫一家“匆匆坐了胶济车上北平去了”。

胶济：沿线风景看过来

坐在火车上的郁达夫，被沿线风光所吸引：“最使我感到兴奋的，是过潍县之后，到青州之先，在朱刘店驿(引者注：胶济线上的一座车站)，从车窗里遥遥首阳山的十几分钟。伯夷叔齐的古迹，在中国原有好几处，但山东的一角孤山，似乎比较有趣一点。因为地近田横岛，联想起来，也着实富于诗意。”(同上)

田横岛，位于即墨东部海域。典出《史记·田儉列传》。秦朝末年，齐贵族田横起事，自立齐王。汉朝建立，田横率部属五百人逃亡海岛。刘邦召之，田横不欲臣服，途中自杀。田横部属闻之，悉于海上自杀。后以“田横岛”指忠烈之士亡命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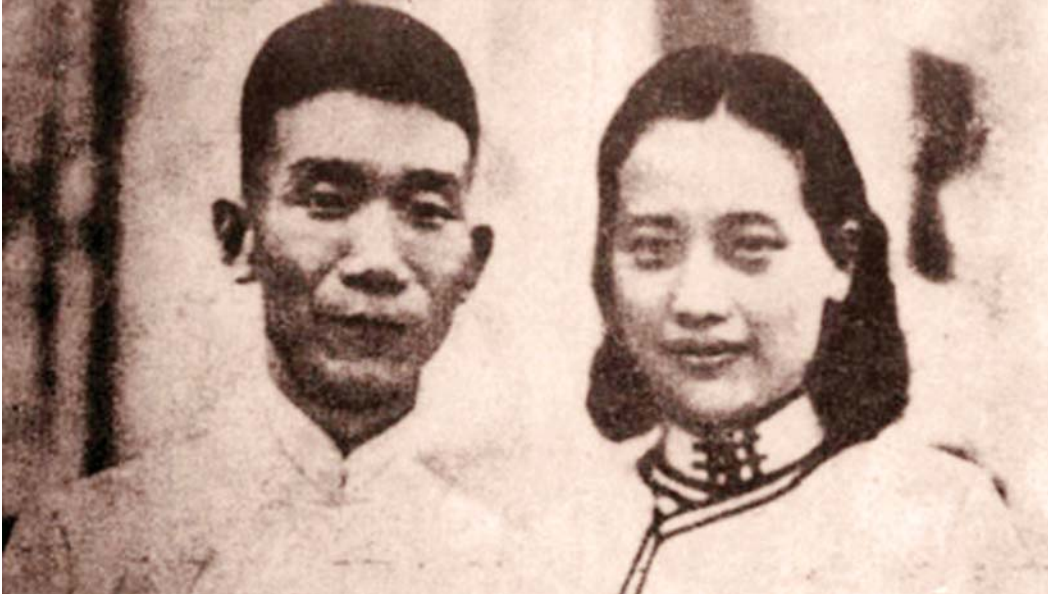
首阳山同样是忠烈之士亡命之处，无怪乎郁达夫有此联想。

首阳山，又名孤山，位于昌乐城东，与伯夷、叔齐有关。

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王子。相传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先后逃到周国。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

联想于此，郁达夫不无感慨：“洁身自好之士，处到了这一种乱世，谁能保得住不至饿死？我虽不敢仰慕夷齐之清高，也决没有他们的节操与大志，但是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尽可以与这两位孤竹国的王子比比了。所以车过首阳之后，走得老远老远，我还探头窗外，在对荒山的一个野庙默表敬意。”

文中所说“野庙”，乃夷齐庙，始建于南北朝时期，位于孤山峰顶，有大殿，厢房，类似今天的四合院。可惜仅存基石和碑碣。



郁达夫、王映霞夫妇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有一篇文章《孤竹君之二子》，回忆与郁达夫创办《创造季刊》的艰难。二人借酒浇愁，郭沫若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有在首阳山上饿死！”

这篇文章写于1932年。郁达夫所言“饿死的一点，却是日像一日”，是否与此有关也未可知？又或许指自己经济的拮据？尽管他的写作收入不算低，但毕竟还有与原配的3个孩子要养。

对于沿线名山，郁达夫耳熟能详：“至于青州的云门山，于陵的长白山，白云山等，只稍稍掉过头一望，明知道不能去登，也就不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名山胜地了；可是云门的六朝石刻，听说确是货真价实的历史上的宝物。”

的确，云门山摩崖石刻乃著名景观，更有一个巨大的“寿”字，高7.5米，仅“寸”字就高达2.30米，所以当地有“人无寸高”之说。

济南：蒲菜莲蓬最鲜美

傍晚近6时，乘坐11个小时火车后，郁达夫一家终于到达济南。下车后，直奔位于趵突泉附近的李守章家。

李守章(1905年-1994年)，江苏南通人，曾是郁达夫在武昌师范大学的学生，也是郁达夫的朋友。时在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郁达夫告知李守章夫妇，这次来济南只是路过，不会耽搁很久。当晚，他们约定第二天游览济南。

这天，郁达夫一家夜宿浦滨宾馆(经一纬四路)，离胶济铁路济南站(经一纬三路)很近，离津

浦铁路济南站也不远。令郁达夫很不爽的是，浦滨宾馆“臭虫蚊子极多，一夜未能安眠”。(《避暑地日记》)

次日，在李守章夫妇的陪同下，郁达夫一家游览了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千佛山，以及大明湖中的历下亭、张公祠、北极阁、铁公祠等名胜古迹。

在郁达夫看来：“家家流水，户户垂杨的黑虎泉一带，风景最为潇洒，大明湖的倒影千佛山，我倒也看见，只教在历下亭的后面东北堤旁临水之处，向南一望，千佛山的影子便了了可见，可是湖景并不觉得什么美丽。只有蒲菜，莲蓬的味道，的确还鲜，也无怪乎居民的竞相侵占，要把大明湖改变作大明村了。”(《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之后，郁达夫一家匆匆赶至津浦铁路济南站，坐5:05的特快车赶赴北平。郁达夫在游记中说：“映霞还没有到过北平，想在没有人侵占去之前，去瞻仰瞻仰这有名的旧日的皇都。”(“在没有被人侵占去之前”，自然是指日本。当时日本侵华之心已昭然若揭。)

北平：《故都的秋》诞生记

就像到青岛是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郁达夫到北平，也是友人王之述，这个友人，就是铁路出身的作家，也是编辑王之述。全国解放后，王余光任北京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人民铁路出版社编审。

据西南大学陈裕容在《王余光考论》中介绍：王余光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

抗战时期，村里青壮年晚上都聚集在村里的小学校，学文化、听演讲。说是冬学校，也是地下党组织接头、联络、活动的“站点”，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地方。

冬学成就秀才村

□ 高厚福

30年前，烟台日报社记者胡连杰走进母猪河畔的泽头镇大洼村，惊讶地发现，200多户的村庄，人人学文化，户户重教育已凝聚成村风、社气。尤其是国家恢复高考以来，升入大学的人数一年多其一年，平均三户就有一名大学生。胡连杰以《秀才村的攀比风》为题写了篇新闻稿，自此，大洼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秀才村”。

冬学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泽头镇1940年就获得解放。人民政权诞生之初，除领导拥军支前、减租减息、土地革命，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就是号召各村把“冬学”办好，让农民学文化得知识。每年从秋收结束开始，到来年春季播种前结束，前后有五个月的时间，农民学文化，称之为冬学。

抗战时期，村里青壮年晚上都聚集在村里的小学校，学文化、听演讲。说是冬学校，也是地下党组织接头、联络、活动的“站点”，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地方。每天进冬学学识字村民还可听到各村教会、青教会在高小读书的青年学生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及什么叫减租减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如何配合区公所反奸反特等等。那时村里读高小的青年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学会的会员，夜晚都到村冬学协助民师教农民识字，教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思想，冬学里的政治气氛一天天高涨。去邻村完小读书的王宗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他17岁离家外出，一直活动在昆崙山抗日根据地。26岁那年从噶里区委书记晋升崑崙山县委副书记、书记。1952年他在文登团地委书记的任上被党中央调干到苏联学习三年，学成回国后任文登县委宣传科兼任山东省团校校长。这时，同村小学的同学，村冬学的“小先生”高志正任省团校的副校长兼教育长。小小的大洼村飞起一阵凤凰，共同执政山东团校，算是一个奇巧的趣事在山东大地传颂多年。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军事顾问高峰，在泽头完小读书时就是学会会长，地下共产党员，村冬学的“小先生”。1943年他离村入伍，转战胶东地区打完日本鬼子，直追猛打国民党兵，先后参加过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渡江几大战役。1950年首批赴朝鲜参战，朝鲜战争停战后，他回国到总参装甲兵部工作，越战期间任昆明军区作战部长，参与对越反击战的指挥，越战结束，军休北京。高峰是一名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人，今年“九·三”阅兵式上，他乘坐着抗日老兵方队的3号车上受阅，全村人都为他点赞和骄傲。

1947年的春天，著名的二月二大参军，冬学学员高忠宪、毕大山二人带头报名参军，随后又



有七八名学员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洼村冬学是一所名符其实的培养人才的摇篮。

妇女识字班让农村文化解贫

解放初期，党的“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工作方针，同样放在做好妇女教育工作上，村村办好妇女“识字班”是具体工作落脚点。

村妇女识字班的组织者是妇救会长王桂凤，一名地下共产党员。她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是她的性格泼辣，为人正直，对村妇女工作认真负责。她在识字班中带头学识字，带头学抗战歌曲，带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她常常借妇女们学文化之余，组织发动全村妇女纺织布匹，开展生产自救，还发动妇女缝袜做鞋，支援前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她离家外出，多年未归。直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过后，王桂凤回家看望老丈人，村里人这才知道她是受党组织委派到敌后做民运工作多年，全国解放后，被调到中央某直属企业当工会主席，住唐山。

大洼村第二任妇女主任叫孙宜凤，是从邻村孔格庄嫁过来的新媳妇，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心直口快，能说能干。她是发动妇女学文化，支援前线各项活动的能手，对妇女识字班一步一个脚印地抓下去，步步都有新起色。

“妇女识字班已经开学了，不分老，不分少，人人都可进学校……”这是建国初期，文登专署扫盲办公室编印农村妇女识字班专用教材第二分册第一课的开头语，朗朗上口，韵味幽雅，广受妇女学员喜欢。由于各级党委对农村妇女教育工作的重视，列入各级妇联工作的重点工作，区(乡)政府为各村培训专职民师，按各村妇女文化水平不同，分文盲、半文盲两个班次，各村要按新编教材设定的教学课时要求，可据本村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可在星期天或学校学生放假时，借用学生教室，半日上课。自此，“妇女学校”就代替建国前，树荫下的午间“妇女识字班”，逐步纳入按计划，有步骤的教学活动。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大洼村青壮年妇女，人人参与，个个有进步，不仅学会日常应用的汉字，还懂得不少社会知识，妇女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应该说这是一场革命性的投入，带来的是人才硕果累累。

烟台教育局原局长高远洋、大连动车车辆厂总工程师高洪光、深圳清华培训中心副院长李叙泉等，都是大洼村走出来的。他们都出身贫困，父辈均属识字不多的半文盲生产队干部，天天忙于集体生产劳动，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关照孩子们的学业，母亲们则因为上了妇女学校，都成了教育孩子的担当者。大洼村人才辈出，功劳在于母

亲和妇女学校。

雪中送炭助村办学

抗日战争时期，因日本鬼子多次“扫荡”，社会物资相当匮乏。当时学生上课都是自带小凳、蒲团，席地而坐，写字用的是石笔、石板，特别贫困的孩子只能在捡来的瓦盆瓦片上写写画画。抗战结束后，部队在大洼村建起的造纸厂撤走，一些废物的木料留给村里。村公所就找木匠将这些废料做成木架，横椽上宽窄相近的木板，以代替课桌。白天，小学生可自带小凳，伏在木板上看书写字；晚上，上冬学的成年人也可以用上这样简单的“课桌”了。

1947年冬，居住上海的李宗智先生回乡看望父母，顺便到村办小学和邻居老人家看望。李先生是一名有知识的安装工程师，兼有实体企业的小资家。那时的上海市尚未解放，国民党盘踞。李先生回上海后几经周折，雇用一条风船，载上2000斤大米、几大纸箱学生用的写字本、木质铅笔和少量钢笔等物品，从上海发到文登张家埠港。他在信中写道，大米是给村办商业合作社筹用的，笔、本和铜鼓、军号是给学校学生和冬学学员学文化用的。从此，大洼村实行“供给制”，由学校老师定期给学生和冬学学员发放笔和学习本，钢笔多作奖品，鼓励学习优秀者。这样的作法一直坚持多年，极大地激励起全村青壮年和在校学生学文化的积极性。

扫除文盲模范村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冬，是文登县扫盲工作大发展、全面落实的十年，是农村文化工作最活跃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区(乡)党委都先后设一名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书记，区(乡)政府扫盲办公室，专职扫盲干部增到两人。农村冬学普遍改称“农民夜校”，《农民识字课本》也由省扫盲办统一编印，统一发行。第一本主要是教学生字和单词，附有旧式汉语拼音；第二本主要选用常见的事物和通用的词汇，第一课的题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一课是教写“便条”等等。农民从书本上可学到二十四节气，怎样种田，怎样选优良品种，学以致用，很受欢迎。

那时的农民夜校，不再是单纯读书写字了，还兼学唱歌，开展一些社会宣传活动，还组织一些有文艺特长的骨干学句办秧歌队，排演文娱节目。大洼村校曾先后排演过《赤野河》、《小二黑结婚》、《小姑贤》、《西厢记》等多个剧目，大大丰富了村民年关佳节的文化生活。

1959年秋，文登县要求全县各单位抓好扫除文盲的扫尾工作，开动起全县所有的宣传机器，

文坛的一位作家、编辑、文学活动家。其文学生涯始于1926年，作品受到郁达夫赏识。1929年，王余光集结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惜分飞》。为此书作序者，就是郁达夫。

王余光1905年出生于四川自贡的名门望族，1924年考入北平交通大学铁路管理学院。1930年分配到天津，在北宁(北平-辽宁沈阳)铁路局工作。1934年7月，在天津创办《当代文学》月刊，任主编。由于刚创刊，很缺稿子，着急向郁达夫约稿，于是向郁达夫开出一个诱人条件，答应为其办铁路免票，邀请其到北平一游。

这在郁达夫的日记中得到印证。据郁达夫同年7月16日(当时还在青岛)日记记载：“接天津王余光信，谓胶济、津浦路免票，可为我办，望我秋后去北平一游。”

郁达夫不是铁路职员，何以能办铁路免票？中国铁道博物馆的李子明先生解开了谜底，他在《是谁让郁达夫免费坐火车》中写道：

在民国，有大量各色人等，凭借各种关系，可以弄到铁路免票，从而免费坐火车。

1927年3月，民国交通部颁布了《国有铁路临时免费乘车免票规则》，规定铁路免票分为公用和优待两种。公用免票主要是针对交通部、铁路工作人员、因公出差，可以申请使用；优待免票对象是中央及地方高官、外国大使等，经交通部特许，可以使用免票。对于免票的使用方法，则规定只限于本人使用，不能乘坐特别快车等。对于免票的制发，规定“免票由路局自行制定呈部备案发行，但长期免票先得部许可不能发出”。

应该说，这个规则对于免票适用人员的范围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配套措施也很完善。然而，日久生弊，铁路免票很快就成了铁路一大弊政。主要原因是免票的滥发。地方军政各界、警察、货运商人常常以公务往来之名，向铁路申请发放免票。一经通融，即为常例。据当时粗略统计，各铁路局每年签发的长期免票多达数千张。有人观察，当时京沪(南京到上海)铁路头等车的乘客，几乎全是免票人员。有人甚至气愤地说：“当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几于身着中山装或佩戴任何证章者，均得免票乘车。”

很多铁路工作人员违规向亲友发放免票，前文提到的王余光即为郁达夫代办的免票，就是这种。在民国，这种免票非常常见。

自然，有了这张免票，这次从青岛到北平，郁达夫坐火车一分钱没花。但这一情况，郁达夫只记在了日记中，而没有出现在游记中。毕竟，这是违规之举。

据《王余光考论》记载：“郁达夫到天津住在王余光家，王余光就跟着他一路到北平要稿。”同时也陪他游玩，并约请他写篇北平秋色的散文。《故都的秋》即是郁达夫应王余光要求所作。

这一说法同样有郁达夫的日记为证。8月16日，“接人间社快信，王余光来信，都系为索稿的事情，王并且还约定于明日来索稿。”17日，“晨起，为王余光写了二千字，题名《故都的秋》。”

故此，《故都的秋》算是一篇急就章。这天，是郁达夫到北京的第四天。作品很快发表在9月1日出版的《当代文学》第二期上。后被评论家誉为名篇，入选语文课本。

《故都的秋》，可谓铁路作家的催生之作。郁达夫8月中旬到北平，9月初离开，其间不过十多天，就写出这一名篇。而他在青岛一个月，却只字未写。是否可以这样说：一张铁路免票，换来一篇美文？

报刊宣传扫盲，广播喇叭宣传扫盲，村村张贴扫盲内容的标语，黑板、识字牌等随处可见。公社(乡、镇)干部进村包点，分工负责。凡40岁以下的农民，不分男女，能识到1500个汉字的80%者，即识到1200个单字者为合格，可为脱盲。每个村的文盲、半文盲者，按花名造册登记，识字率合格者达到70%的村庄(大队)可申请报捷。大洼村经过多年的努力，男女社员均达标，全部脱盲。大洼村在1959年全县扫盲文盲工作大报捷中，被评为泽头公社的“模范村”。经过近20年的扫盲为主体的农村成人教育工作，终于让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农民的文化学习开始转移到学文化同科学种田、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方面上来。

在大洼村组织农民学文化过程中，有两个农民特别值得称颂：一个是高忠民，他不仅是村农民夜校学习的佼佼者，也是村大队一名称职的农业技术员。他讲起科学种田，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对农作物的种植栽培和田间管理有一套成熟的经验，获得各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和全村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另一个叫王治民，可算作村中奇人。要讲他的文凭，只能算作村办冬学肄业。他学会旧式汉字拼音，一本破字典伴他终生，人生聪明，记忆非凡，过目不忘，对古典小说、野史故事通晓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夏季的夜晚，总有些村民聚集在村东场地上，边乘凉边听王治民说书。讲者起劲，情节动人，听者心旷神怡，回味无穷，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这在没有电视、看不到电影，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难能可贵。

老村长的嘿嘿笑声

抗战结束到建国前后的几年里，大洼村的村长叫高忠堂。他为人憨厚，笑口常开，办事认真，广受群众尊重。他卸任后，全村人仍习惯称他“老村长”。老村长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都是高小毕业，老三、老四高中毕业，唯独四子高厚福，高中毕业留村务农，1976年当上村长，1979年接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30多年。村里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待老村长，但是，别人并不知道，老村长心里装着的最大愿望在于子孙辈的成才上。

老村长孙子，孙女共8个，其中5人先后考入大学，两人高中毕业。1983年，当孙子高和祝第一个升入大学，考进山东师范大学时，老村长嘿嘿的笑声不断，乐不可支。自此，老村长喜事频频传，5人相继升入大学，有一人毕业后选择当了人民教师。2003年，93岁高龄的老村长安然谢世。老人家还不知道孙子高波考入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孙女高燕清考入中国医科大学读研究生，二人研究生毕业均就职金融行业，成为单位骨干和高层管理者。重孙女美丽，山东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从医文登中心医院。重孙女美育，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就职于《中国青年报》社。如果老村长在天有灵的话，他的嘿嘿笑声定会传向另一个世界。

30年前的大洼村，每三户中就拥有一名大学生，而30年后的今天，大洼村籍的大学生到底有多少，谁都说不清。但是，大洼村学文化重教育，改变着多少家庭的贫穷落后状况，村里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